

現當代文學叢刊

西方視域下的—— 字源語文與文學文化

張雙英 著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西方視域下的—— 字源語文與文學文化

張雙英 著

臺灣 學生書局 印行

西方視域下的——字源語文與文學文化

張雙英著. — 初版. — 臺北市：臺灣學生，2013.03
面；公分

ISBN 978-957-15-1584-7 (平裝)

1. 漢語 2. 詞源學

802.18

102002903

西方視域下的——字源語文與文學文化

著 作 者：張 雙 英
出 版 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人：楊 雲 龍
發 行 所：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七十五巷十一號

郵政劃撥帳號：00024668

電話：(02)23928185

傳真：(02)23928105

E-mail: student.book@msa.hinet.net

http://www.studentbook.com.tw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

印刷所：長 欣 印 刷 企 業 社
新北市中和區永和路三六三巷四二號
電話：(02)22268853

定價：新臺幣六六〇元

西 元 二 〇 一 三 年 三 月 初 版

80295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ISBN 978-957-15-1584-7 (平裝)

自 序

筆者自國內的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研究所畢業後，為了擴大視野，增長見聞，並學習較有系統的研究方法而到美國留學。取得學位之後，回國教書，再經歷赴美國、加拿大講學，以及到目前的教學崗位上繼續服務，這一長達三十多年的路途，如今回想請來，竟然像是一瞬般快速！

在這段漫長的歲月中，筆者一直慶幸能夠以興趣與職志——探討「文學的意義」——為工作主軸。但因了解自己缺少過人的才分，所以經常懷抱著「勤能補拙」的理念自勉，且時時自我詢問：一個學術研究者如果未能在各個階段都留下一點認真的研究心得，豈不有虧職守？而這些心得是否真能讓自己即時地反省每一履步的行跡，並獲得同好的熱心指正呢？因此之故，這本論文集除了收有多年來比較符合學術要求的論文十多篇外，也收入了若干筆者歷年來討論「文」的篇章中尚具可讀性者以饗讀者。

回想三十多年前，筆者到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註完冊後，便向指導教授報告我往後的研究計畫；但還沒有報告完，就立刻接到一陣威力巨大的震撼教育：原來，我在台灣的中文研究所完成的碩士論文（「經學」中的「禮學」）並不屬於「中國文學」的領域！指導教授當下立斷，馬上以我的興趣與想法為基礎，建議我將研究重心從「經學」的「制度與思想」轉到「文學批評」，並要求我深化該論

文中所使用的文字學與社會學研究法。於是，在選修與旁聽許多必要的課程後，我將原來熟悉的「文字學」方法逐漸系統化為「字源學」（philology），並同時強化與這一學門緊密相關的「語言學」（linguistics）知識。至於論文中僅觸及皮毛的「社會學」方法，則漸聚焦於「文化人類學」（anthropology）與「神話學」（myth）兩種學門。這一段學習過程雖然艱辛，卻也讓我在從事教學工作後，有能力以它們為基而寫出一些屬於不同學術領域的文章。

在這本集子裡，下列四篇即是運用「字源學」、「語言學」與「文化學」的方法所寫的學術論文：

〈論《詩經·大雅·生民》詩的一些問題〉一文，對出現於《詩經·大雅·生民》詩首章裡的「履」、「帝」、「武」、「敏」、「歆」等五個字，以「字源學」、「文化人類學」與「神話學」等方法分別詳加考證。最後，綜合其內涵指出：歷代對這句詩或整首作品的許多解釋，其實各有所偏；而若以「履帝武敏歆」這一句的原本意涵為據，則比較合乎現代學術中有關古文化的研究成果，同時也應屬更為周延的解釋應該是：〈生民〉詩是一首充滿神話和傳說內涵的作品，它是遠古時期的某一族人刻意將其始祖的遭遇加以神化的頌揚式謳歌。

〈大陸推行漢字簡化運動的省思〉一文則兼用「字源學」與「文化學」兩種方法，先指出歷朝歷代其實都有兩套文字系統同時並行著：一套是官方頒布或認可的文字系統，屬於這系統中的「字」都兼具了形體統一與涵意明確的特色。另一套系統則是人民為了能夠方便與快速的溝通，乃將某些官方文字簡化；然後會隨著時空的改變而逐漸形成流行於民間的簡便文字系統。至於這兩套文

字系統間的關係則是互動的：當流行於民間的文字與官方文字已成為兩套差異甚大的系統時，官方為了維持溝通工具的統一，便會再頒布一套新的官方文字系統。換言之，文字的改變其實是一種必然的趨勢。至於文字的改變規律則可大抵可歸納出兩大原則：為了「容易辨認」，文字會趨向「繁筆畫」；但為了「方便書寫」，則文字反而會走向「簡筆畫」。因此，若以這種論述為據，則大陸推行的漢字簡化運動應該也可以作如是觀。

〈析論「天下為公」的境界——以《禮記·禮運》篇中「大同」與「小康」兩章為解釋基礎〉一文，則是以儒家學說中的最高境界為依據，再以語言學為基，透過精細解讀文字與句子的方法，先分析〈禮運〉篇中的「小康」章：「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貨力為己。」的句法，指出其關鍵句子為「天下為家」，而其意涵為：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等倫理關係都能以「禮制」為綱紀時，所有的人民都會「為」（意思為「替」）自己的「家」（家庭、家人與家族）努力付出。接著，再以此說為參照面，指出〈禮運·大同〉章的主旨為：大同世界是一個全天下人都生活在互相照顧的體系中，並以此章中「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這段在句法與意涵上都與〈禮運·小康〉章形成對比的關係為據，指出其末句中的「為己」兩字既然是「不應只『為自己（的家）』設想、服務而已」，那麼「天下為公」中的「為公」兩字，當然也應該解釋為「為天下設想、服務」了。換言之，「天下為公」的意涵應該是：全天下人都要替天下人設想，為天下人服務，而非孫中山先生所解釋的：天下是大家的天下。

〈從比較中、英文字詞在詞句中的先後次序看中國國語（Mandarin）的特色——一個文化觀點的考察〉一文，係筆者到美國密西根州的大山谷大學擔任交換教授時，對中文課裡的大學生以西方觀點對中文（Mandarin）提出的諸多問題所做的整體性回應。由於他們的問題幾集中於：表達完整意思的「中文句子」是如何組成的？筆者把回答的基礎立在「中國傳統文化」上，然後將討論的對象壓縮到組成中文句子的字與詞。由於詢問者的母語是英語，所以選擇了對中、英文的表達方式——即：字、詞在詞、句中的先後次序——進行比較的方式。筆者先凸顯中文單字異於英文之處，譬如：中文「字」的形體含有與其密切相關的聲音與意涵，而且形體也不會隨著數量與時態的不同而改動；接著說明「複合詞」中「單字」之組成規律，實隱含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因素；最後再以「詞語」在「句子」中的排列順序係以文化傳統為根本所反映出來的結果做結。綜合言之，若以「字」與「詞」為組成意思完整的「句子」之基礎，則這些「字、詞」在「句子」中的「順序」顯然是由兩大文化因素所主控：其一是「時間」，由它們出現的「先」與「後」來排列在句中的前、後次序；其二是「空間」，由它們所涵蓋範圍的「大」與「小」來排列在句中的前、後次序。

取得碩士學位之後，筆者到亞利桑那大學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並將學習重心集中到兩個領域上。其一是古典詩歌與詩論；因指導教授的專攻領域為魏晉到唐朝的詩歌，所以他建議我選擇唐朝之後論詩材料豐富的「宋朝詩話」為學位論文的焦點，因這不僅是一塊尚待開發的學術處女地，裡面更充滿著中國古典詩論的珍貴資料。於是我乃選了中國詩論史上第一本詩話《六一詩話》為我的博士論

文題目，也使詩歌批評成為我任教以後的研究重心之一。這本論文集裡便收有下列六篇與詩歌有關的學術論文：

〈情意山水——試論孟浩然山水詩的特色之一〉一文，係針對某些學者完全接受西方文學理論中的「美學觀」，認為好的「（山水詩）必定都是未曾經過詩人知性介入或情緒干擾的山水，也就是山水詩必須保持其原來面目。」而發。在筆者的認知上，分析中國古典詩歌應該要回到中國古典詩歌的傳統上，也就是先掌握「言志」、「詠懷」、「緣情」等這些將詩人與其詩歌作品緊緊相連的觀念。然後以「現象學」為批評方法，分析孟浩然的「山水詩」之所以讓人「感動」，感覺很「美」，絕非因為符合了西方那種「美學觀」，也就是詩人將詩人自己的主觀完全與身外的景物隔絕，而採取完全客觀、深入而細膩的將山水描摹出來的寫法所致。相反的，孟浩然的「山水詩」之所以能感人至深，正是因為他已將自己心中那複雜而豐富的「情意」融入到「山水」之中，感受到眼前的山水樣態含有其心中的各種情與意，因而將它們抒寫出來所致。換言之，山水詩呈現在讀者眼前的各種山水的外在形貌與樣態，其實正是詩人心中的各種不同情意的外現。

〈論「宋詩」的特色及其形成的主要背景——以詩人的時間與空間為基點的考察〉一文，則是有感於不少學者以「一代有一代的文學」之觀點來說明「中國文學史」，而使「楚騷、漢賦、六朝駢文、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這種過於空泛的說法甚為流行，所以想提出不同的看法供大家思考。論文先指出，學者用來說明「宋詩」特色的主流方法，係建基於「宋詩」「與唐詩的特色有何差異」上，然後將「宋詩的特色」歸納為「以筋骨思理取勝」、

「貴在深析透闢」、「氣骨美而瘦勁」等數項文字簡略而涵義空泛的描述語。然而，當一個朝代像宋朝一般，擁有超過數百年的歷史時，它在詩歌上的特色果真如此單薄而膚淺？這種作法不但認為「宋詩」在數百年中一直沒變，以至於僵化了其活潑性，甚至也窄化了它的豐富內涵。因此，本文乃以周延性為觀照面，從「宋朝詩人對詩的態度」出發，指出「宋詩」最突出的四大特色應該是：(一)宋人認為詩歌的性質是輕鬆與休閒的，(二)宋詩的內容與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三)詩人的集團性活動甚為風行，(四)即使都屬於宋朝，不同時期與不同地方的詩都有其獨有的特色。

〈論胡仔《苕溪漁隱叢話》的編纂方法及其寓義〉一文，首先肯定篇幅多達一百卷的《苕溪漁隱叢話》因保存了大量珍貴的「詩話」資料，所以在文獻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接著以此書中竟然出現了比例甚高的「苕溪漁隱曰」的論詩文字為據（前集佔有百分之二十，後集甚至高達百分之五十六），指出編纂者胡仔本人不但也是一位頗有見解的詩論家，而且也有透過「如何編纂」這部「詩話叢書」的方式來表達自己詩歌觀點的用意。論文從這部「叢書」的結構切入，先分析組成全書「結構」的「基本因素」為「則」，並說明這些「則」裡的主要內涵。接著，爬梳「則」與「則」之間的「連結方式」，並推論何以如此連結的可能原因。最後再提出本論文研究的結果：胡仔係以歷代詩論家對「詩歌形體」的論述為選擇對象點，選出心中認可的論述，然後依照時代的先後為序，將它們排列成自己心中的「詩論史」。

〈胡仔詩歌批評析論〉一文指出，胡仔雖然是宋朝著名的詩話叢書《苕溪漁隱叢話》的編纂者，然若細分析他在此一叢書中對詩

歌與詩論的分析文字——「苕溪漁隱曰」中的文字，應該會同意他的詩論確實含有不少傑出的觀點。而根據此書中所載，胡仔的主要詩觀大約包括了：(一)他所討論的主要對象為唐朝的「近體詩」；(二)他的論詩方式近似西方的「實際批評」，而其評斷詩歌好壞的標準則以是否符合「聲調格律」為主，如「換頭」、「黏對」、「落韻」等；(三)在更為細緻的批評上，他大抵服膺「黃山谷」的詩觀，如「奪胎、換骨」、「點石成金」等練字法；(四)他在評論詩歌整體時，最主要的特色為提出「變體」，認為這類詩體可以活化與增加在數量上其實非常有限的「近體詩」的「正體」格式。

〈王夫之詩論體系試探〉一文指出，王夫之的詩學著述豐富，並深受論者推崇。但論者在肯定王氏的詩論時，卻往往提出不同的看法，例如：郭紹虞認為，因為王氏是站在「讀者」的立場，所以才會用「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的角度來解釋孔子的「興、觀、群、怨」之說。但黃兆傑卻認為，王氏的詩論實以「作者」為最主要的觀照點，所以才會提出以詩人心中的「情」與外界的「景」融合為一的「情景交融」為詩歌的最完美境界。有見於此種矛盾，本文乃從全面觀照為出發點，指出王氏整個詩學體系應可理解為：(一)以哲學觀為基，將「人」、「情」、「詩」三者視為不可分離的「整體」；(二)詩人以「詩」說自己的「情」，並以「詩」教導讀者的「情」；(三)「詩」中含有「法、意、勢」等三層深刻的內涵；(四)「詩」係由「情」與「景」密切無間地融合而成。

〈試探商禽詩的「心象」與「意象」〉一文指出，商禽的新詩作品數量雖少，但卻因其內含有一種與眾不同的特色而受推崇。本文的目的在挖掘形成商禽新詩這種特色的具體內涵，而歸納出以

下數點結論：(一)商禽認為「詩」和「詩人的性格、出身、經歷」及「其生活的世界」密切相關，(二)但他明白反對「詩是述懷與載道的工具」，(三)他所主張的是「詩的內容」是「意象與心象」的結合，(四)因常取材於身邊的人、事、景、物，所以詩歌的格局不大，(五)以隱微而富有象徵意涵的修辭和精心設計的形體寫詩，而將他的內心活動與外面的世界融合成一幅文字畫。

筆者在亞利桑那大學的另一個學習重心為西洋現、當代文學批評。本論文集裡所收的這類學術論文有下列數篇：

〈戰後台灣文學界的第一波西方文藝思潮——現代主義與新批評〉一文，希望能說明二十世紀的五〇到七〇年代時，台灣的現代文學界何以會漂浮著一層濃濃的西洋風——尤其是西洋文學批評中的「現代主義」(Modernism)與「新批評」(New Criticism)。論文首先指出，這一現象與當時的政治背景——戒嚴時期——息息相關。當時的政府一方面透過威權取締所有違背政策的言論與思想，禁絕一切揭示社會黑暗與懷念過去溫情的文藝活動，另一方面則大力獎助符合反共政策與戰鬥精神的文學創作，致使當時的文壇充斥著內容充滿虛偽的濫情，而主題幾乎千篇一律的愛國與戰鬥作品。這種在政治主導下而使作品的內容趨向單調與枯燥的情形，終於逼使不少具有自由精神的文學創作者與研究者轉向外國文壇去取經。由於西洋文學批評中的「現代主義」與「新批評」中的「現代」與「新」都有「進步」的含意，並且因來自西方而可避免被扣上違反政策的帽子，所以乃適時被引介進來。這一引進的動作，後來對台灣文學界產生了兩大影響：其一是許多作家以「現代主義」的寫作技巧為圭臬，在作品中細膩刻劃人物心中的變動不居的心理，致使

這類作品與愛國作品大異其趣；其二是以「新批評」的細部分析方法來解剖文學作品，而使較具系統性的文學研究方法逐漸取代了抽象式的文學評論。

〈「寓言」也能說服人——《莊子·秋水篇》的結構設計析論〉一文指出，《莊子·秋水篇》雖是一篇闡述道家思想的文章，卻也是一篇傑出的文學作品，因它具有吸引人的故事、鮮活的人物與生動的對話。但筆者認為這篇文章最突出之處，應該是在讓人閱讀之後，不僅可立即明白它的內容，並能於自然而然中接受它的觀點；而這種效果，則是因為它具有非常高明的「文章結構」所致。本文因此以這篇文章裡的第一個部分，也就是「河伯」與「北海若」的互動為例，酌參西方「結構主義」和「修辭學」中的「論辯術」觀點來分析這一結構。最後指出，這篇文章包括有三個要項：其一是文章的內容與主旨以含有深意的寓言故事來呈現，而其目的在希望透過這種方式來吸引人。其二是虛構出兩個進行對話的人物，透過他們之間生動的「問」與「答」，使文章的主旨在「回答」的部分裡表達出來。其三是這些「問答」之間隱含著非常嚴謹的邏輯關係，亦即以層層遞進的方式將這篇文章安排成七組先後有序的「問答」，而形成一篇組織嚴密的文章。

〈論關漢卿「單刀會」中的衝突〉一文指出，「單刀會」作為保留最完整的元朝雜劇，大多數的現代學者對它提出的兩大論點為：(一)它的主題在刻劃主角「關公」的英雄形象，(二)只擔任使關公出場時顯得較為自然的伏筆地位的第一、二折，其實沒有必要，甚至可刪除。這兩項論點，筆者認為都有值得再斟酌之處。筆者以元雜劇的「結構」必含「四折」，以及戲劇的最主要元素為「衝突」

出發，分析組成此一戲劇的四折結構其實頗為緊密，因它們係以東吳的魯肅為串聯者，讓他在每一折裡都代表著衝突雙方中的一方，即在第一到第四折中分別象徵「個人名譽」、「愚妄淺識」、「不誠」、「個人德行」等意涵，而逐項與喬公所象徵的反戰爭的「天道」、司馬徽所象徵的「具體事實」、關公所象徵的「才能德行」、蜀漢所象徵的「歷史正統」等形成「衝突」的狀態。因此，將它的主題視為在刻劃關公一人的英雄形象，實有以偏概全之失；而認為此劇的前二折可有可無，也有忽略元雜劇的完整結構與戲劇的衝突要素的缺點。

〈試從「社會批評」的觀點論落華生「春桃」中的諷刺手法及寓意〉一文，是希望在以「文學作品」為唯一重點的「形式批評」、「新批評」等風潮中，凸顯還有其他同樣深具意義的文學批評可用來分析「作品」，因此乃選擇了主張文學與社會具有密切關係的「社會批評」為方法，來析論落華生（即許地山）的小說〈春桃〉中所隱含的諷刺手法及寓意。論文以三位主角為分析對象，認為悲劇人物李茂的身上實含有品格雖忠誠，但仍被傳統觀念中的夫妻名分所束縛；劉向高雖是三個主角中唯一受過教育的人，卻不僅為人虛偽，自己還正扮演著傳統觀念中的典型女性角色而不自知，竟然還死愛面子，跟女主角春桃要夫妻的名分；至於女主角春桃的寓意則更為深刻，她在小說中被安排為三人中唯一能自主賺錢，同時還養活前面兩個男人的女性，因此，顯然含有顛覆「女主內，男主外」的傳統觀念的寓意。這些深層寓意，只要將小說放到它被創作的時代環境裡，便可十分清楚的呈現出來。

〈論《迷園》的敘事結構及其歷史記憶〉一文，係基於不少學

者運用西方「後殖民主義」與「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觀念，將李昂的小說《迷園》解釋成「悲情台灣」的「歷史記憶」，以及小說作者在接受訪問時也親口說，她「要來替台灣建構一個歷史」，並有成為定論的傾向，所以筆者乃希望從「小說」的「虛構」本質出發，也借用不同的西方文學批評來析論前述說法是否可信。本文先指出這本小說的主要結構為：將女主角的「當前經歷」與「回想過去」分為「實」與「虛」兩條軸線，然後藉著其間因缺少關聯性所產生的「空白」，在讀者心裡引發西方「接受美學」中的「召喚」效果，讓不同的讀者可以提出自己的解釋。其次則深入分析小說內容裡以「建構台灣歷史」為重心的「虛」的「回想」部分，指出其建構方法與「新歷史主義」若合符節，即在理論上將「歷史」視同「虛構的小說」，以至於造成小說裡的主角所抱持的態度為：寧願採信「傳說」而捨棄「祖譜」，寧願接受「盜賊」而不願承認「受朝廷封賜者」為祖先。對於以虛構為本質的小說作品而言，作者如此寫當然並無不可；但若評論者想要由此而將其申論為「建構台灣歷史」，那只能說是無稽之談了！

〈試探凌煙《失聲畫眉》的深層意涵〉一文指出，《失聲畫眉》在得到百萬小說獎後，並未受到學界的重視；但在「台灣文學」隨著政治與社會情勢的轉變而成為顯學之後，小說中所觸及的：台灣歌仔戲文化的沉淪、社會底層民眾的卑微生活、女同性戀者的情慾、本土和國族的認同等議題，都成為熱切討論的話題。本文也同意這部小說確實包含了豐富的議題，但仍希望能以「小說美學」的角度為立足點，指出其更具深刻意義的數項特色：(一)採取近距離的全知敘事觀點來敘述，使小說的故事能兼有生動的人物與寬

闊的視野等優點；(二)清楚點出歌仔戲班是為了能在現實社會中繼續生存，才將忠孝節義的表演內容改為迎合觀眾低俗口味的色情表演，因而使小說含有傳統文化正在沉淪的象徵涵意；(三)藉著細膩的刻劃女同性戀者的極端態度與異常言行，來凸顯社會底層人民在現實的生活環境限制下，只能以違反倫理道德的言行來取得基本的人性需求。

〈西洋人眼中的現代中國文學——以〈現代中國文學裡的國家主義〉一文為例〉一文，是筆者於二十五年前奉派到美國任教時，因讀到珍妮特·法羅特 (Jeannette L. Faurot) 的〈現代中國文學裡的國家主義〉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因有感於外國學者對我國現代文學的了解頗有偏失而寫的論文。筆者認為該文值得再討論之處不少，諸如：(一)以「文學中所含的國家主義」為研究焦點，卻將「國家主義」粗略的區分為「以知識分子為主」的「文化」，和「以農民為主或包括全民」的「政治」，如此的區辨不僅理論依據薄弱，且說法粗疏空泛。(二)將「現代中國」劃分為 1912-1949 與 1950-1980 的大陸，以及 1949-1980 的台灣等三區塊。前二者的年代因未曾中斷，故如此區分並無不可；但台灣在 1949 之前的文學史裡，難道完全沒有「國家主義」的文學作品？(三)在舉實際作品為例的析論上，該文所用之作品並非中文原作，而是經過個別學者的挑選，然後再翻譯成英文作品的選集，亦即屬於的二手資料。以此為據的論述是否能擁有十足的公信力？(四)論述時，也未見引述任何有關此一領域的學術研究成果！筆者因有見於此，乃撰此文呼籲國內中文學界應重視現代文學的研究。

在學術性論文之外，筆者也從過去泛談文化與文學的文章中，

選入若干尚具可讀性者，供讀者閒暇時瀏覽。不過，在此要特別說明的是〈上古中國人對文、道和兩者之關係的看法〉一文，係筆者剛到美國留學時的指導教授周策縱先生的英文論文，因其研究方法對筆者的研究進路影響甚鉅，所以筆者在回國任教不久，即邀請後來曾任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副所長的好友林慶彰教授與筆者合作，將其譯為中文。譯文完成後曾寄給周教授，請其訂正，但卻於郵件數度往返途中遺失。周教授已與於前年辭世，現將其編為附錄，既以永懷師恩，並向好友致謝。

這些文章能夠以「書」的形式出版，筆者必須致謝的對象很多，首先是好友兼同事陳仕華教授，因他的督促，才使筆者動手收集與整理散落各處已久的舊作。其次是學生書局的慨允支持，因它使筆者在進行這件事的過程中，不僅有機會積極的回顧過去，也擁有策勵將來的收穫。此外，筆者也要對淡江大學中文系博士班的賴靜玫同學表示感謝，因她在筆者舊作上的整理、排序，並將它們繕打成初稿，本「書」終於能在預訂的時間內呈現於讀者面前。當然，面對這樣一本帶有懷念色彩的論文集，筆者心中最為感念的，就是一直在背後全力支持的妻子，因為她的愛心與付出，才能免除我的後顧之憂，讓我擁有平靜的心來兼顧做父親、老師與研究者的角色；若這本書能有一些成果，願這些成果能夠顯現她的辛勞於萬一。

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雙英 謹誌於台北

二〇一三年二月

